

# 赵惠俊 || 北宋前期的词中城市与朝野词风的离立

原创 赵惠俊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3月9日

## 北宋前期的词中城市 与朝野词风的离立

**摘要：**在北宋的经济文化面貌影响下，北宋前期词中产生了开封、两浙诸郡与洛阳三大重要城市空间，各有相应的词情词风。京城开封荟萃四方财富，词体写作以帝王与贵戚为中心，内容富侈靡艳，词风雅俗共存，主要遵循贵戚的审美趣味。两浙诸郡以士大夫为写作中心，于江南山水间成清丽风格，展现着士大夫的清雅意趣。二者成为词体文学发生朝野离立的文学内部因素。洛阳虽也是以财富艳游闻名，但主导者是士大夫而非贵戚，故处于沟通朝野的地位，相关词作体现着士大夫青睐的富贵表达。而且洛阳空间的特殊性允许以欧阳修为代表的青年士大夫参与词体写作，为北宋中后期的词体革新奠定了作者基础。

**关键词：**北宋词；文学地理；词中城市

在词体文学的应歌时代，词作的主要创作场合是酒宴歌席，主要写作内容是灯红酒绿间的脂粉莺燕与男女情事，一曲曲章台走马的背后依靠的是具备雄厚财力的城市，而在唐宋时期，能够支撑起这种文学任务的城市其实也就都城与益州、扬州等少数区域性中心城市，于是词中城市也就集中在这些地方，久之便固定为词中重要的地理意象，与艳情豪宴主题发生双向互动。再加之北宋建立之后，通过铺叙市井繁华以赋颂太平盛世的文学手段逐渐在词中普及，于是奢华靡丽、轻薄风流的样态更加成为读者对词中城市的主要感觉映象。

读者的感觉映象往往只择取文学的一面，富贵风流并不能统摄词中城市的全部。词人在塑造城市意象的时候，除了需要适应艳情豪宴的写作场合，其实也与时人对于相关地区的特定感觉文化认同密不可分。如是词中城市在共性之外，亦有丰富的个性，有些城市甚至会出现与富贵迥异的萧疏样态。这种现象在《花间集》中即已发生，花间词中的长安与成都非常典型地展现着

城市的巷陌繁庶与贵族公子的风流浪荡，而金陵、姑苏等江南城市却是一副水村山郭的萧疏与沧桑，词情也以斜阳草树间的闲愁为主。这种离立显然与唐末五代时人对各地域不同的感觉文化认同以及地域文学传统密切相关。此外，离立双方的城市身份更值得玩味，长安是唐朝故都，成都则是后蜀的都城，二者与金陵、姑苏实际上构成了一组朝野关系，甚或是对敌国的想象，因此它们在词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实际上是时人对于朝野不同的感觉文化认同，也就构成了一种朝野文学的离立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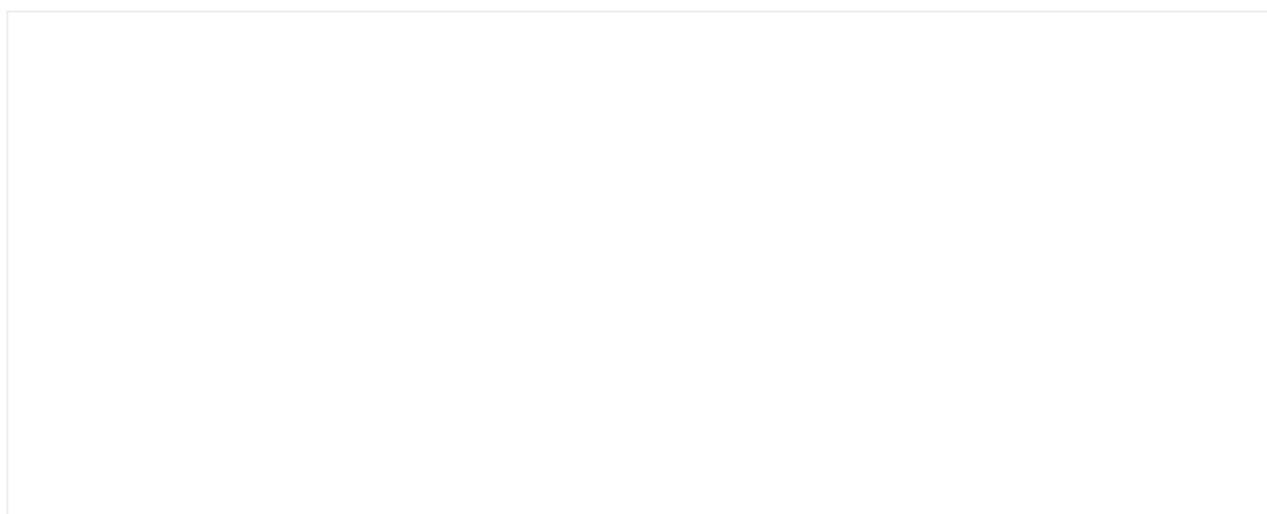
朝野离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分布格局，反映的是地方文化圈对于京城文化圈的一种离心逆向趋势。在唐宋之际，随着具备高度文化素质的作者群体不再是京城所独有，地方文学中心的数量迅速增加，身处地方的作者往往会做出与京城不一样的文学表达，朝野离立也就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北宋中后期，政治上的党禁人为地造成了朝野作家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派系，于是朝野文学在此时极度撕裂。词体文学也深受这种文学大环境的影响，徽宗朝的朝野词风便因此呈现出各自独立的两副模样。不过文学现象的发生除了与政治历史因素有关之外，也深受文学内部发展因素的影响，北宋前期词承继了萌芽于花间时代的朝野城市差异，并结合相关城市在北宋时代的经济状况、空间环境与文化感觉等形成了新的朝野城市意象，已然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前就初步形成了朝野不同的词情词貌，成为来自文学内部的徽宗朝词坛朝野离立因素。本文即拟梳理北宋神宗朝之前重要词中城市的经济与社会面貌，讨论各自空间下的核心作者群体的差异，以及迥然有别的感觉文化认同，试图理解潜藏包孕着的朝野文学的离立趋势。

## 一、开封：繁庶与豪艳

在北宋人的感觉文化认同中，京城依然保持着繁庶富贵与恣意艳游，而且在北宋东京开封稠密的人口与高昂的地价面前，这种感觉较之前代更加浓郁。北宋初年的科举士大夫就已经开始感叹开封过高的地价，王禹偁《李氏园亭记》开篇便云：“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其后他解释了地价之高的原因：“虽圣人示俭，宫室孔卑，而郊庙市朝不可阙已。有百司之局署，六师之营壁，侯门主第，释宇玄宫，总而计之，盖其半矣。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设或有之，则又牵于邸店之利，其能舍锥刀之末，资耳目之娱者亦鲜矣。”<sup>[1]</sup>原来除却中央政府机构占据了半数土地之外，大量的商业土地需求是地价高昂的另一层重要原因，这是唐宋转型之后的新现象。在商业

市场的作用下，开封私家园林经常被富室高价买下，之后就被分成若干商铺、旅店再次租售。王禹偁所记之李氏园亭就遭致这样的命运，其在主人去世后以四百万的价格被卖给了富室，好在太宗出面干预，保住了这片园林，但是太宗竟然是用内府钱从富室那里同价赎回，虽然这个举动与太宗的个性密切相关，然而这终究是帝王遵守土地市场规律的事件，开封土地商业化程度即可想见。

面对如此的土地市场，刚至京师的科举士大夫往往面临买房租房的困窘无奈。欧阳修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一诗中就说到：“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间。”[2]可见外籍官员在开封购置房产是相当艰难的事情，而能在开封拥有一处规模较大的私家园林则显然需要巨量财富，这是刚入仕途的科举士大夫无能为力的，只有世家贵戚方能为之。正如张咏所言：“公之门勋耀于世，孝友光于家，得不崇轩馆，疏亭苑，以发其荣耶？……且大梁天帝之都，亩地千镒，一庐十金，安然辟广庭，作芳致，岂不尊性而贵奇欤？”[3]既然财力雄厚的贵戚把置办开封私家园林作为自我富贵身份的标志，那么开封大多数园林的主人也就是贵戚，他们承办了大量的开封私第宴饮，而即席应歌的词体文学活动也就以他们为中心，相关词作需要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心中所好，渲染与展示着贵戚的富贵豪奢，词情词貌也就愈发地纸醉金迷。不过无论哪家贵戚，在开封紧俏的土地市场面前也只能保有围墙以内的空间凿池植树，因此开封的园林绝大多数是封闭的内向的，围墙之外就是熙攘的街巷，并没有其他的风景。于是京城的私第宴饮只能在有限的园林内部空间举行，宾主与歌妓皆束缚于此，连视线也无法向外活动。两相结合，使得京城宴饮歌词愈发单纯地注重豪奢宴饮、美艳妓女、华美器物而不太关注园林风景。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部分）

高度的土地利用使得开封缺乏开阔的公共空间以供士民游乐，但是君王

需要与民众一起出现在公共空间以完成与民同乐的任务，这是宣扬太平盛世的基本手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宋帝王选择将皇家园林在特定时段向民众部分开放，临时扮演公共空间的角。其间最重要的公共性皇家园林就是金明池，其为都城士民游观与君民同乐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也催生了第一批极具京城特质的游湖词，与贵戚私第宴饮词构成了京城词坛的两大主流。在京城游湖词中，可以发现贵戚私第宴饮所无的外向风景，展示着词中京城最为雍容精工的富贵样态：

### 破阵乐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声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沈沈，洞天日晚。[4]

这是一阕典型的通过铺叙金明池游宴来赋颂帝王与太平的慢词。上片从清晨写起，焦点皆在金明池的景物上，从远处的花树，到湖中的建筑，再至近前的娱乐，依次写来，由远至近，以动接静，是极富层次感的笔法。过片自然转入对皇家游池活动的铺陈，不仅点出了金明池的皇家身份，亦用“镐宴”“鱼藻”等典故称颂着时世的太平[5]，更以典故为媒介，将视线自然地由君王转移到同游的士民。不过柳永以女性作为游人的代表，既是词为艳科的传统，亦是众多身份的女性荟萃开封的展现，这也是独属京城的感觉文化认同。在全词的煞尾处，柳永铺排出黄昏中的沉沉云海，正与开篇的朝阳相互映衬，构成了一个从早到晚的完整时间，再次烘托着京城的雍容。这阕词的铺陈方式与时间结构是慢词典范，也只有帝王与繁庶二因素交融的京城才能促使柳永创制出如此谨严密丽的体式。随着南渡之后开封与杭州的空间转换，源于京城的“屯田蹊径”在西湖之上得以重生，成为南宋大量游湖词的滥觞。

不过京城中只有一位帝王，大部分围绕贵戚展开的京城词作并没有如上词这般的雍容华贵，竞富斗侈的样态与皇家审美构成了相对的雅俗。实际上雅俗交杂也是京城词的重要特征之一，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也非简单对立，其实都是由巨量财富催生，与高昂的地价同一渊源。城市中的财富越多，富人自然越多，为了满足富人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从乡村流动而来的服务行业从业者也会大量增长，构成了出入于富人生活但实际经济收入低下的世俗群体，词中游妓便是其间的重要代表。更何况中国古代城市的繁荣往往与城市财富的累积关系较小，更多是因为该城市拥有的巨大流通财富数字。美国汉学家

施坚雅即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往往建设在以水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线上，城市的形制、人口有着长期稳定的特性[6]。形制、人口的长期稳定正说明财富并未随着时间在城市中累积，那么城市的繁荣就与交通运输线带来的流通贸易密切相关。南北之人携带财富与商品来到城市，进行交易、消费，然后带着交易后的商品与财富离去。尽管他们的财富并未留在城市中，但正因为交易行为的发生，城市经济依然会无比繁荣。可是又因为城市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财富及人物的积累，于是也就难以沉淀出精英而典雅的文化，风俗也就长时间地徘徊在尚富竞奢的世俗层面。这一点对于北宋东京来说格外明显，王安石即对东京的财富与风俗作出类似的解释：

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物毕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更奇制，夕染诸夏。[7]

开封四方交汇的性质不仅造就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尚奢，也使其成为流行文化的风向标，政治中心的身份也促使地方民众纷纷效仿京城的喜尚，开封高度商业化的土地市场也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典型体现。同时为满足四方毕会之人的生活、娱乐等需要，相关从业人员再一次大规模扩张，于是出现北里平康妓女如云的场景。因此恢宏殿宇、相连坊巷、娇艳游女、人物时尚才会成为开封独享的感觉意象，而冶游豪宴、狎妓赏春也就随之成为感觉中符合开封景观的生活方式。这种感觉不仅促成着词风的尚艳尚奢，也改变着士大夫的出处空间，成为京城词作的重要表征：

#### 透碧霄

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稜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傍柳阴、寻花径，空恁鞦韆垂鞭。乐游雅戏，平康艳质，应也依然。仗何人、多谢婣娟。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8]

这也是一阕典型的颂体之词，依次铺叙了帝居的壮丽与京城市民富贵狎邪的生活，但与上引《破阵乐》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破阵乐》是应帝王之命撰写的应制词，赋颂的太平之象是自上而下的风化，是帝王视角中的天下太平。此词则与之相反，过片“观光得意”表明词中人是以前普通市民的视角体认京城，是在冶游平康巷陌中自下而上感受到的太平气象。最为重要的是，煞尾“宦途踪迹”一韵点出词中人的身份是士大夫，全词铺叙的京城景象是他的回忆，而词旨则是在宦海浮沉中期望重回京城艳游的岁月。

出处选择是士大夫的重要人生命题，也是常见于诗文的主题。最传统的出

处之别就是在朝为官与归隐江湖，大多数士大夫感到宦途疲惫的时候，总会向往与城市有别的山林意趣。这阙词中的士大夫虽然也有退出官场的心理，但是他却选择了传统上与官场密切相关的京城空间，在平康巷陌中的风流宴饮成为了渔樵耕读之外另一种逃避政治的方式。这是京城感觉文化认知在词中的反映，有时还会发生与士大夫归隐传统完全悖逆的空间选择：

安公子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游宦成羁旅。短檣吟倚闲凝伫。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9]

词中描写的景色是羁旅所见，这片蒹葭南浦、鹭飞渔唱的空间是传统士大夫向往的归隐场所，他们可以在此实现烟波钓徒的愿望。为数甚多的士大夫在遇到词中之地时，会选择买田置产，以待他年来此隐居。然而此词尽管也呈现着水村鱼市与京城繁华的对立，但是柳永的词笔却将其描述成一种为官的苦痛，把京城风亭月榭中的欢娱艳游视作弃官后的快乐。最后出现的杜宇唤归是弃官归隐的经典典故，柳永也是用其表达从官场抽身而归的愿望，只不过词中人从江湖回归城市的期待恰与传统从城市回归江湖的方向相反。这种异质情感并不是科举士大夫的主流生活面貌，因为他们大多不能承担京城高昂的地价，无力在京城置办退居后的产业。于是此词应该还是一种京城感觉文化的类型化表达，利用京城繁庶的文化感觉在应歌之曲中歌咏羁旅薄宦的艰辛。

## 二、两浙诸郡：清丽与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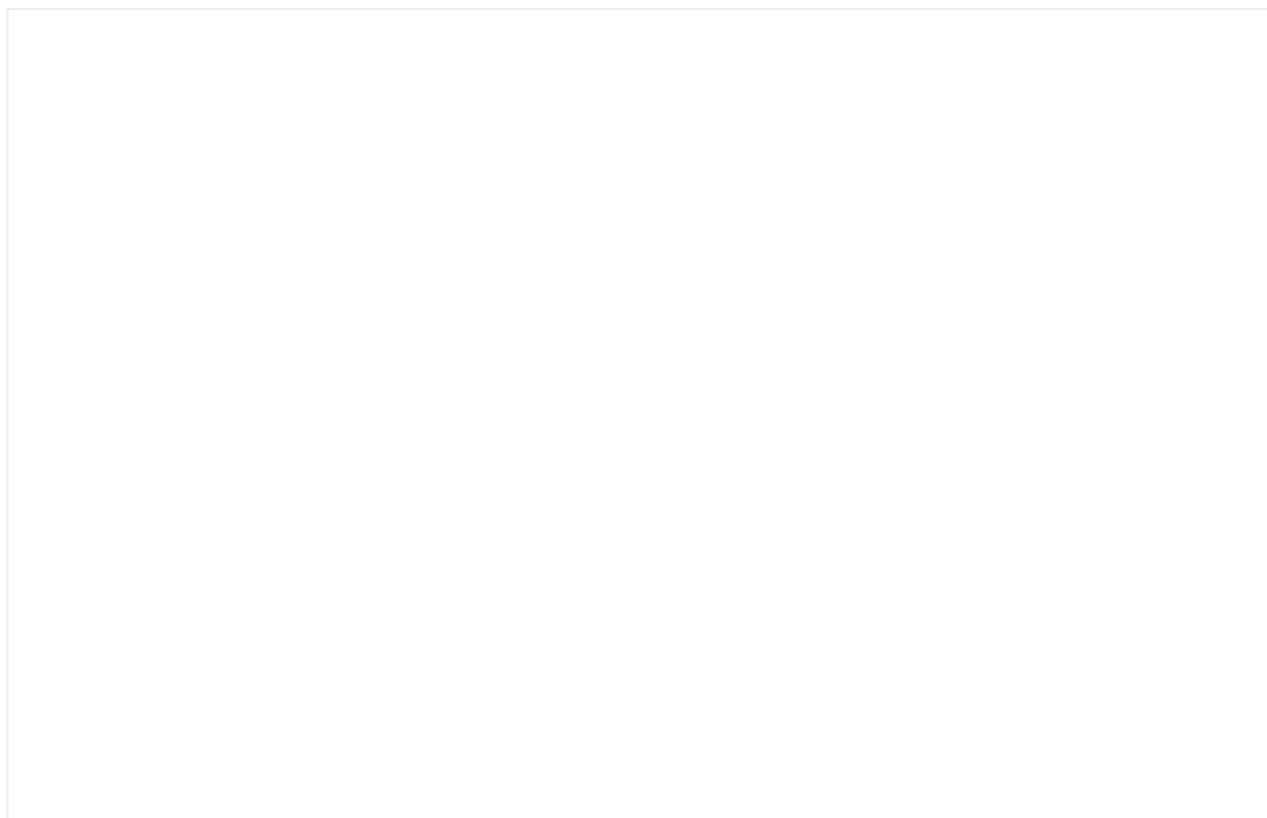
上引柳永《安公子》一词展现的水村渔市风貌，与唐五代以来对于江南地区的感文化认同基本一致，而辖区大致与今日江南范围相同的北宋两浙路也确实呈现这样的景观，深刻影响到了其地词体文学的风貌。

尽管两浙地区也存在诸如平江、杭州等规模较大的城市，但由于城市经济主要由运河流动的财富发展，从而与四方财富交汇的开封相比还是差距极大。这种经济差距在土地利用上有着明显的体现，苏舜钦《沧浪亭记》即云：

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南游，旅于吴中，始僦舍以处，时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狭，不能出气，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不可得也。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

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10]

作为东南剧镇的苏州，连郡学附近都出现这么一大块废弃之地，可以想见城中的闲置土地非常多。这片废地原来是吴越国贵戚的私家园林，与王禹偁所记的李氏园亭相仿佛，若放在开封，显然很快就会被富室买去开商铺，而李氏园亭四百万的售价更是沧浪废园价格的一百倍，京城与地方城市的经济差距实可想见。既然地方城市的地价是科举士大夫可以承受的，于是他们便习惯于在地方求田问舍，甚至直接扩充官府修建园林。陈尧佐即言其就任潮州后“即辟公宇之东偏，古垣之隅，建小亭焉，名曰‘独游’。清江照轩，叠巘堆望，几案琴酒，轩窗图书。是独也，不犹愈于人之嗷嗷者乎？”[11]可见与京城园林展现贵戚的财富与地位不同，地方园林更多是士大夫风雅趣味的表达，产生于此的歌词自会深受影响，产生与京城不一致的清疏风貌。



《江帆山市图》

而且地方词坛的中心人物就是作为郡守的士大夫，他们不仅时常召集宾客聚会，同时也要在所辖空间内从事类似帝王在京城所为的与民同乐活动，于是会产生地方郡守携妓出游的风气，也就会有铺陈郡守游宴的赋颂词章。这些词章就需要适应士大夫审美趣味与地方城市的文化感觉，从而与京城游宴词就构成了显著差异。依然以柳词为例·



## 笛家弄

花发西园，草薰南陌，韶光明秀。乍晴轻暖清明后。水嬉舟动，禊饮宴开，银塘似染，金堤如绣。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遣离人，对嘉景，触目伤怀，尽成感旧。别久。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空遗恨，望仙乡，一晌消凝，泪沾襟袖。[12]

此词上片铺叙地方游湖场景，主要描绘的是山川风物与游人欢娱，与柳永《破阵乐》相比，缺少了铺陈雄伟建筑的句子，这正是京城与地方的景观差异，使得地方游湖词更加注重自然湖山，风格也就清疏许多。而两词之间“游妓”与“游女”的用词差异说明地方游湖活动中的女性群体主要是官员携带的官妓或营妓，不存在京城士女云集的场面，奢靡的意味也随之变淡。下片转入对京城宴饮的追忆，完全不涉及园林的风景，只在意宴饮的奢华与人物的豪纵，已然呈现了富贵与清赏的朝野之分。欧阳修对这种京城与地方宴饮场合所展现的不同精神风貌有过明确的解释：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13]

欧阳修明确提出两种美乐，一是城市的繁华欢娱，一是乡林的山水佳趣，这正是传统意义上朝野不同的感觉文化认识，前者主要由京城来承担，而与京城存在较大经济差距的两浙城市往往扮演后者的角色，于是北宋涉及两浙的词篇依然延续着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人的视线和笔触会更多投向江南山水，建构出一片水村渔市的空间。同时，江南山水又反过来推动着词体文学向清丽的方向发展，这是山川风物对人情风俗的巨大影响，宋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如范仲淹在来到睦州后给就这样告诉晏殊两浙山水对士大夫日常活动与文学趣味的整体影响：

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为浙江。渔钓相望，凫鹭交下，有严子陵之钓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严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从事，俱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



客，愚然投诗，具为郡之乐，有如此者。[14]

范仲淹细致描绘了今日浙江富阳、桐庐一带的山水风貌，可见两浙山水在文人士大夫心中亘古不变的地位。范仲淹进一步表达了在这片风景下首当其冲会产生隐居的文化情感，这不仅是因为清且幽的山水是理想中的隐居环境，而且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著名隐士严子陵也为两浙增添了浓重的文化记忆。最后范仲淹更提到了今日两浙地区存在的两种文化风尚：一是士大夫好文酒诗会，并在其间助以歌曲之兴，尽管范仲淹提到的是琴曲，但其郑声一词还是透露着长短句词体的身影。两浙作为南唐、吴越的旧地，自然会保留着歌词的遗习，而南唐词人近似北宋科举士大夫的身份使得北宋士大夫便于入乡随俗地发为歌词。另外一种文化风尚就是诗僧群体，江南诗僧会主动与士大夫交往并投赠以诗，士大夫与其唱和的诗篇自然要尊重方外的习惯，从而僧诗清苦雅淡的特征也会不自觉地影响士大夫在两浙地区的文学创作。二者便是两浙地区在自然山水、文学传统之外的另一层影响词风的元素。

这样一来，两浙诸郡在北宋初年就成为开封之外另一个词体文学创作中心，呈现着有别于京城豪奢、市井升平的清丽风貌。核心创作群体也有别于京城贵戚，主要围绕士大夫展开，既是南唐传统的延续，也是北宋地方政治以科举士大夫为中心所致。因此清丽的词风背后包孕的是士大夫意趣，与错落其间的士大夫园林交相辉映，而受诗僧影响的清冷风格与林泉主题也融入了写于两浙的歌词：

常州武进县厅壁，有旧题二曲，未知作者名氏。云：“倦客东归得自由。西风江上泛扁舟。夜寒霜月素光流。想得故人千里外，醉唼应上谢家楼。不多天气近中秋。”“北固江头浪拍空。归帆一夜趁秋风。月明初上荻花丛。渐入三秋烟景好，此身将过浙江东。梦魂先在鉴湖中。”[15]

两阙小词清新淡雅，使用两浙地区常见的意象表达着宦宦倦意与山林归趣，《浣溪沙》一调六句七言的体式也允许词人按照近诗的方式填词，延续着张志和在此地开创的以令曲歌词道渔隐的传统，是为两浙歌词的经典面貌之一，与诗文同调。而作为词体文学主体的游宴词也主要体现着士大夫的生活意趣，与上引柳词一样呈现出与京城的不同风貌。只不过对于占籍两浙的词人而言，他们不会像柳永那样时时挂念京城艳游，而是全身心地享受清美山水中的游宴渔唱：

虞美人

荇花飞尽汀风定。荇水天摇影。画船罗绮满溪春。一曲石城清响入高云。 壶觞昔岁同歌舞。今日无欢侣。南园花少故人稀。月照玉楼依旧似当时。[16]

张先这阕词以湖州实际景物苕水苕花起兴，是湖州诗文的常见手段，苏轼《宿余杭法善寺寺后绿野堂望吴兴诸山怀孙莘老学士》即有句：“北望苕溪转，遥怜震泽通。”施注引《杭州图经》云：“苕水出天目山，古老相传，夹岸多苕草，秋风吹花，浮如飞雪，因以名溪。”[17]可见与京城词泛言坊市里巷不同，地方文学往往会被富有特色的实际风物吸引，呈现强烈的地方色彩，而两浙地区的芦花、苕草、溪水、太湖更是诗词互通的实际地理意象。下片使用词中常规的今昔对比章法，抒发物是人非、艳事不再的传统情感。但是词中抒情主体并不是花间习见的男子作闺音，而是明确的男性口吻，而且思念的故人很可能并不专指女性，而是文期酒会中的男性友朋，或许这就是范仲淹提到的与下属诗酒唱和之际发出的郑声吧。可以说，两浙清丽的山水与词学传统不仅允许士大夫得以从事词体文学的写作，并可以在词中自由地表现自己的生活与意趣，词体的情事容量随之得到扩容。

### 三、洛阳：游宴与名教

在开封与两浙的朝野离立之间，还有一座扮演中间角色的城市洛阳。作为五代旧都，洛阳也拥有大量私家园林，艳游风气也很盛行，但其与开封最大的不同就是活跃其间的人物主要是科举士大夫。很多北宋名臣在致仕之后选择定居洛阳，过起日日笙歌的富贵悠游。这种行为一方面秉承着洛阳城的汉唐遗风，另一方面则在承担着通过自我富贵悠游的生活展示太平的致仕官员责任，于作者身份的角度促成了洛阳文学与京城两浙皆有异同的沟通性面貌。

北宋之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梁、后唐等朝代相继在洛阳建都，隋唐两代则设为东都，承担向长安转运江南财赋的任务。于是洛阳城的经济模式与开封有着时代性差异，宋朝之前的都城不仅拥有繁华的经济，还荟萃了帝国最主要的门阀士大夫群体。门阀不仅拥有雄厚的财力，还具备雍容的涵养与渊博的学识，从而洛阳城一方面有着富贵豪侈的生活，一方面还有浓郁的文教之风，这是后周一朝才成为都城的开封无法比拟的。受此影响，洛阳的富贵艳游风气也并非像开封那样是士庶走集、军功贵戚展示富贵身份的结果，更主要是缘于士大夫文化的传承。周师厚明确指出：“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阳衣冠之渊藪，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栉比。其宦于四方者，舟运车辇，取之于穷山远辙，而又得沃美之土，与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拟其美且盛也。”[18]可以推见洛阳的财富、园林与牡丹花一样，是来

此定居或致仕的士大夫将四方之所得汇聚于此，建构出可供他们传承贵族时代衣冠风流的空间。这种经济模式使洛阳的土地不会像开封那样高度商业化，加之前朝故都的格局为洛阳带来的比开封还要大的城市面积[19]，因此洛阳的地价完全在科举士大夫的承受范围内，可供他们自由买地以建造园林。



徐熙《玉堂富贵图》

丁巳明生生商拓山。 “汝阳同社的营建目 一种具有匡中佳子性的文化活中

士小照先生曾指出：洛阳四外的宫建是一种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活动，并常成为历代文士集团活动的场所。“[20]北宋科举士大夫在洛阳的园林建造与相关活动便是属于宋人的承继。宋初李昉就已欲效法白居易，在洛阳重办“九老会”，尽管最后因四川兵兴而作罢，但其梦想却被宋人在洛阳多次实现。参与宋代“耆旧会”的人士往往是一代重臣，科举士大夫的楷模，于是这类私第园林聚会当然承载着科举士大夫的意趣与价值观，洛阳城公私游赏的风气也就不能不受其影响。邵伯温就这样记载到：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21]

醉赏洛阳花是洛阳最负盛名的艳游活动，但是邵伯温却把其视作士大夫与庶民共乐的风流雅事。尽管邵伯温对于看花场景的描写与开封金明池游观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于货利不急也”则点出了洛阳与开封最重要的区别，即崇儒与重商之异，从而文艺风尚自然也就产生名教与徒奢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军功贵戚与宗室贵戚群体也无法在洛阳一味炫富，还是要与科举士大夫作一定程度的妥协，苏辙《洛阳李氏园池诗记》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点，兹节录于下：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漉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圃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园，洛阳之所以一二数者也。

李氏家世名将，大父济州，于太祖皇帝为布衣之旧，方用兵河东，百战百胜。烈考宁州，事章圣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缮守备，抚士卒，精于用间，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将家子结发从仕，历践父祖旧职，勤劳慎密，老而不懈，实能世其家。既得谢居洛阳，引水植竹，求山谷之乐。士大夫之在洛阳者，皆喜从之游，盖非独为其园也。凡将以讲闻济宁之余烈，而究观祖宗用兵任将之遗意，其方略远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园而赠之以诗，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孙，则虽洛阳之多大家世族，盖未易以园圃相高也。[22]

苏辙在开篇也是将洛阳的园林游宴之风认作是汉唐衣冠遗俗，一上来就表明士大夫在洛阳园林游宴是有传统的，是可以被允许的。其后苏辙列叙了洛阳

的山川，这是位处四战平原的开封没有的江山之助，以此论证洛阳的风气是清明盛丽，俨然与两浙山水的清洁秀丽接近，这些都符合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尽管苏辙不得不承认洛阳城最壮丽的园林还是军功贵戚所有，但其在羡慕园囿壮丽之余，仍然不忘发出群体价值之声，指出士大夫与军功贵戚的诗酒交往并非贪慕富贵，而是希望从世家门第中知晓祖宗之法，更好地为自我政治生涯服务。于是也就顺畅地接到了文章的结论——洛阳宴饮艳游风气有着不单以园林豪奢为最高追求的特征，这当然是科举士大夫对于洛阳游宴旨趣的要求。

不过苏辙这篇序文写于神宗熙宁七年，正是北宋科举士大夫精神最昂扬的时期，但这种精神实际上只有极其自律的少数精英才能坚守，特别是在北宋中前期，大多数在洛阳的士大夫尽管承认富贵之外有政治、道德、文学等更高追求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他们还是会迷恋于洛阳园林的富贵太平，毕竟这是允许他们恣意风流的空间。于是，洛阳宴饮尽管承载着科举士大夫的价值观，但洛阳文学的意义更多是在呈现士大夫特有的富贵表达上，还由此促成一批重要的年轻士大夫参与写作，他们日后将成为词体文学的重要作家，朝野双方皆甚为遵奉。这些年轻官员不仅在士大夫园林中依照令曲传统即席应酬，也在与之数量相当的贵戚、寺庙园林中纵饮观花、艳游恣狂，似乎完全没有响应苏辙号召的政治追求。这其实是青年人的常态，是开封新进士出入南北二巷在洛阳的迁移，只不过在洛阳强大的士大夫传统中，这些举止有着较为风雅而不世俗的方式。在这些青年官员中，最杰出的那一位当属欧阳修。

欧阳修与洛阳的相逢正是缘于其中举后的第一任差遣西京留守推官，王水照先生早已揭示，在欧阳修这三年的任期中，洛阳形成了以钱惟演为核心、谢绛为实际盟主的洛阳文人集团，其成员包括了欧阳修、尹洙、梅尧臣、富弼、张先等中青年文士。这一文人集团不仅对欧阳修的政治、文学生命有着一锤定音式的作用，也对宋代文学在诗词文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3]王先生重点论述了该文人集团的诗体写作，而词体文学也同样深受触动，比如欧阳修就留下了这么一阕洛阳词篇：

### 玉楼春

洛阳正值芳菲节，浓艳清香相间发。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24]

这是一阕游春词，但没有京城游览词中常见的如云游女，也不见两浙游春词中的太守，而充满着洛阳的代表元素洛城花。这场寻春之游应该是充满富艳的，但欧阳修并没有露骨地展示艳情或豪奢，只是从侧面烘托出洛城春的恣

意，而且他也并没有沉溺于富贵艳游的快乐，反倒在那尾处翻出笙歌散去后的悲凉之意。这便是士大夫钟情的富贵表达，既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风范，也有在富贵状态下不忘反省自我生命的宇宙意识。这与晏殊赞赏白居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一句最善言说富贵风神一致，是士大夫在享受花前月下的时候才会产生的惊觉。欧阳修这阕洛阳词不仅实践着士大夫的富贵艳情表达，而且还透露着对于洛阳文人集团中的青年才俊来说，近诗之令曲依然是创作主流，相关歌词创作与诗文一样，深受集团核心钱惟演的影响，欧阳修本人正是在洛阳风气与钱惟演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从事词体文学的写作。

钱惟演是吴越王之后，不仅行为举止有着贵族遗风，文学风格也同样秉承着贵族传统。如吴曾《能改斋漫录》“钱文僖赋竹诗唱踏莎行”条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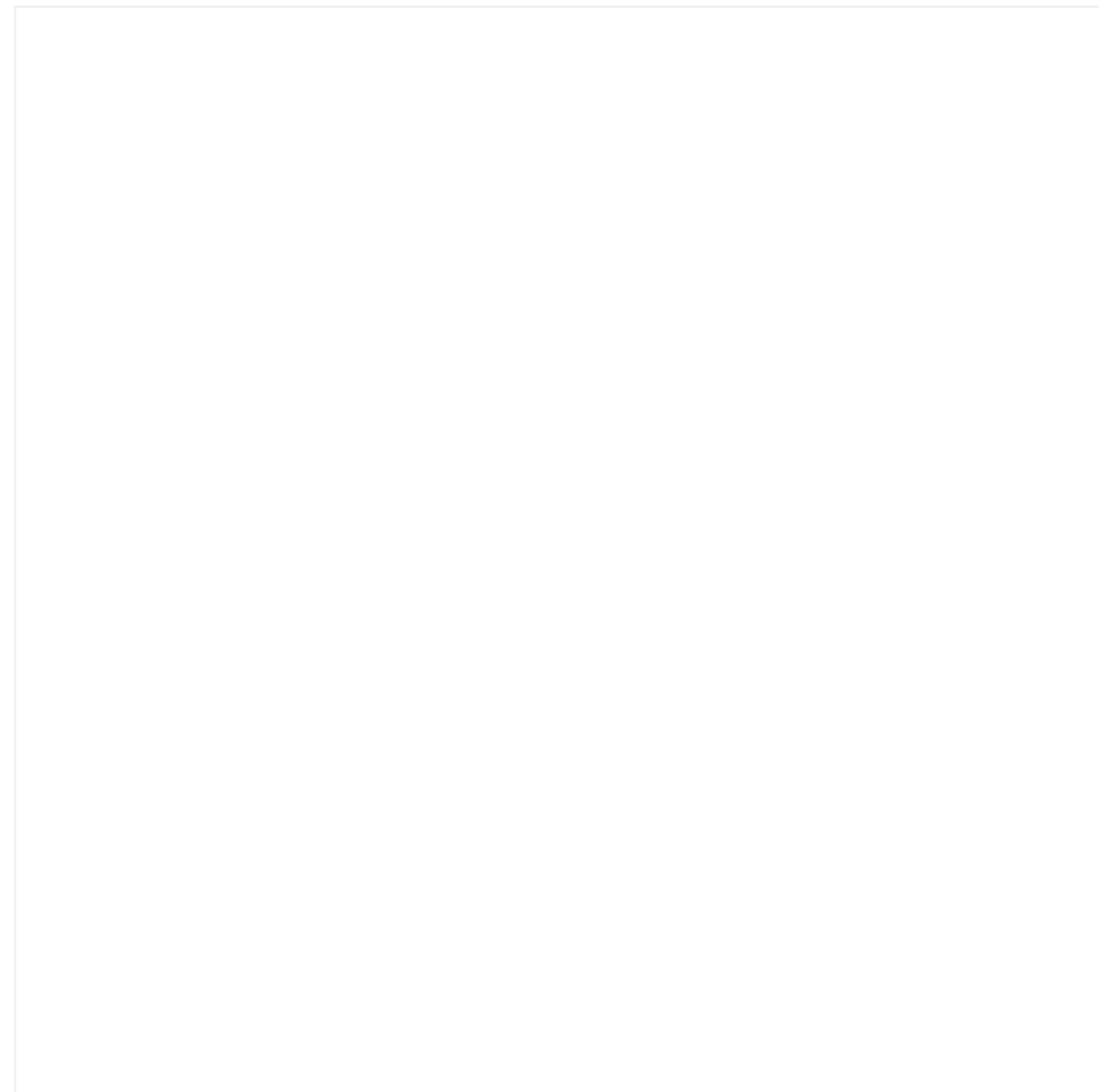
钱文僖公留守西洛，尝对竹思鹤，《寄李和文公》诗云：“瘦五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傍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其风致如此。淮宁府城上莎，犹是公所植。公在镇，每宴客，命厅籍分行，划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胜事，至今称之。[25]

钱惟演的洛阳诗篇完全符合士大夫的高致，尽管《踏莎行》一阕并非作于洛阳，但也可以因之想见洛阳词篇也是传统的令曲，内容也是与诗类似的士大夫关于艳情的趣味。欧阳修诸人往往在钱惟演的洛阳宴饮上撰写歌词，也就需要如上引《玉楼春》一词那样，展现士大夫对于艳情艳事的捷才与风趣，成为他们日后宝贵的文学财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欧阳修词在离开洛阳之后发生的重要变化，正是朝野写作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正相关反映。作为日后科举士大夫的领袖，年轻的欧阳修清楚地知道只有洛阳城才能为他提供轻狂艳游的空间，离开了这里，生活与文学就需要换一副面孔。钱惟演在宴会上劝诫欧阳修不要太过清狂恣游的故事屡见于宋人笔记，这提示着洛阳城实际上只允许致仕士大夫纵情游宴。年过七十的钱惟演当然可以悠游宴乐，然而刚刚踏入仕途的年轻士大夫欧阳修却并不太适合过分放纵。钱惟演用寇准因过度享乐而至晚节不保的事例敲打欧阳修，但欧阳修却敏锐地指出寇准晚年之祸并非由宴饮引起，而是在年纪已老之时还不停止对于权力的欲望。这不啻可以视作欧阳修对宴饮与政治地位的态度，二者是在不同时空做的事情，也是不能同时进行的。如果在京为官又年富力强，那就应该勤恳为政，时刻不忘道德的砥砺；如若已届致仕，那就应该急流勇退，去承担安逸宴乐以示太平的责任，这样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城诗酒风流也就不见得是太大的过错。可以看到，离开洛阳之后的欧阳修展现出不一样的人格面貌，他时刻不忘科举士大夫群体的家国责任、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甚



至在晏殊的家宴上写下不合时宜的讽劝之诗。这其实也从另一方面再次说明，不同的城市空间有着不同的词体写作中心群体，也就具备不同的词体文学写作传统，京城属于帝王与贵戚而地方属于科举士大夫的朝野离立状态在北宋时代即已界限分明，词情词风也已经产生了京城与两浙的大致轮廓。好在此时还有扮演中间角色的洛阳城，能满足科举士大夫对于富贵游宴的需求。到了徽宗朝，党籍士大夫连洛阳也不能居住，朝野之间也就产生极强的撕裂感。不过朱敦儒、陈与义等词人又以富贵的山林野老身份，塑造起新时代下的中间面貌。



[1].王禹偁：《李氏园亭记》，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2].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3].张咏：《春日宴李氏园林记》，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卷八，《续古逸丛书》本。

[4].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增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

219页。

[5].《诗经·小雅·鱼藻》：“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郑玄笺云：“岂亦乐也。天下平安，万物得其性。武王何所处乎？处于镐京，乐八音之乐，与群臣饮酒而已。”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80页。

[6].[美]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10-17页。

[7].王安石：《风俗》，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二，唐武标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0页。

[8].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增订本），第196页。

[9].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增订本），第277页。

[10].苏舜钦：《苏舜钦集》卷十三，沈文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7-158页。

[11].陈尧佐：《独乐园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12].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增订本），第81页。

[13].欧阳修：《有美堂记》，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35页。

[14].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尺牍卷下，《四部丛刊》本。

[15].杨彦龄：《杨公笔录》，黄纯艳整理，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16].张先著，吴熊和、沈松勤编年校注：《张先集编年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17].苏轼撰，冯应榴合注，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2页。

[18].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69册），第348页。

[19].《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记载东京：“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唐汴州城，建中初，节度使李勉筑。国朝以来，号曰阙城，亦曰里城。……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显德三年令彰信节度韩通董役兴筑。国朝以来，号曰国城，亦曰外城。”而西京洛阳则为：“唐曰洛州，后为东都、河南府，寻改为京。梁为西都，晋复为西京，国朝因之。京城周回五十二里。”可知洛阳的城市空间因前朝旧都的缘故远在东京之上。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65页、9268页。

[20].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21].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86页。

[22].苏辙：《栾城集》卷二十四，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5-516页。

[23].详见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第131-152页、第153-173页，第174-197页。

[24].欧阳修撰，胡可先、徐迈校注：《欧阳修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25].吕南公：《能政斋温言》卷1，刘定整理，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整理研究室编。

[2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刘子整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本文原载《浙江学刊》2018年03期，收录于《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感谢赵惠俊老师授权发布。】

编辑：汪宇航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黎国韬 || 前行赞词：不应被忽视的说唱资料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